

“瓦解的逻辑”和现代性的出路：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探究^{*}

张庆熊

摘要：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瓦解的逻辑”为核心，展开对现代性哲学的双重批判：既指向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导致的物化危机，亦揭露黑格尔观念论辩证法以“同一性”统摄差异的哲学桎梏。比较《启蒙辩证法》与《否定的辩证法》的互补性，可以揭示阿多诺的批判逻辑演进：前者剖析启蒙理性异化为操控自然的工具理性，后者则扩展至对康德先验哲学、黑格尔辩证法及现象学的全面反思，强调“客体优先”与“非同一性”原则，瓦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体系。阿多诺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以抽象概念统摄差异，压抑具体经验，最终沦为极权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则以经验贫乏的逻辑消解主体价值，二者共同构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哲学须超越“解释世界”的保守性，转向“改造世界”的实践维度：批判理论通过揭露同一性思维的虚假性，唤醒主体对物化现实的革命意识，并以“星丛”隐喻指向多元文化共存的解放路径。这一批判衔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传统，同时为交往理性理论奠定基础，凸显“否定的辩证法”在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解放事业中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瓦解的逻辑；解释世界；改造世界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5) 07-0024-08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5.07.016

作者简介：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总思路是通过“瓦解的逻辑”对其所处时代的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进行内在批判，从而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哲学寻求出路。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为批判理论贡献了两本奠基性的著作。第一本是《启蒙辩证法》(1947)，这是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阿多诺在这本书中阐发了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思想，规划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纲要；第二本是《否定的辩证法》(1966)，这是他独著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前一本著作的补充和完成。《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论述方式别具一格。国内学界对阿多诺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否定的辩证法》中译本就有三个版本，^①有关《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专著，我所见到

^{*} 本文系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熊十力‘量论’思想研究及其续补”(项目编号：2020CSZZ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这三个中译本分别是：《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年；《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年；《否定的辩证法》，王晓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3 年。

的就有八本。^①这一则说明阿多诺的重要性和广受重视，二则说明对阿多诺的理解和评价是有分歧的。本文尝试通过对照阿多诺前期的《启蒙辩证法》和遗著，并结合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思辨哲学的研究，加强思想背景方面的研究，阐明其思想史意义。鉴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本极其难读的书，本文的初衷是在错综复杂中理出一个简明的头绪。概而言之，我认为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是通过现代哲学思潮的批判为陷入物化和奥斯维辛苦难的现代性社会寻出路，并由此厘清哲学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的关系，为人类的解放开辟道路。

一、《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的互补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发表于1947年，其副标题是“哲学断片”。该书除了对启蒙和现代性历程的辩证分析外，还包含一些相关的哲学短篇文章，它们比较零散，像一个个断片，让人期待进一步完成。阿多诺在1966年发表的《否定的辩证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启蒙辩证法》在哲学论证和批判方面的补充。这两本著作都是对现代性思潮和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或者说，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极权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体现在深挖现代性思潮的哲学根源，并辩证地分析其失误的根源和摆脱困境的出路。因此，《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是在两条战线上的作战，左手打倒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右手打倒观念论的思辨哲学，为克服现代性危机寻找出路。

《否定的辩证法》继承了《启蒙辩证法》的批判主旨，但扩大了对现代哲学的批判范围，不仅批判实证主义思潮，还对康德的先验哲学、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加以批判。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扩展呢？这是因为17、18世纪的启蒙理性在哲学上不仅仅指英国的培根、洛克、休谟等人的经验论，还包括法国的笛卡尔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康德的先验论，而19世纪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作为对启蒙危机的反思而建立的一种综合性的哲学理论。到了20世纪，不仅出现了实证主义思潮，而且还出现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思潮。在阿多诺看来，它们同样作为现代性思潮的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全面的考察和批判。

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现代哲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现代经验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的批判上。该书揭示，启蒙思想一开始所持的知识观就有问题，它只看重知识的描述自然和操控自然的特点，忽视了人的理性在追求意义和价值方面的贡献，从而使启蒙理性走向了工具理性，导致了人的异化或物化，即现代人从操控自然的目的出发沦为效仿自然的物化的人，人从技术的主人不知不觉地沦为技术的奴隶。如果说《启蒙辩证法》的主旨在于揭示启蒙思想如何通过一种辩证的运动走向自身的反面，那么《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是把矛头指向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方式。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力图表明，他所倡导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前者看重具体性和差别性，强调矛盾运动的否定特性，后者在一种抽象的概念运动中强调对立统一中“同一”的方面，压抑具体性和差别性。

人们通常把经验论的实证哲学与观念论的思辨哲学当作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思潮，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评判社会历史问题。当代思想家通常会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二选一，即要么依据实证主义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要么依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反对实证主义。人们也容易带着这种流行的看法去评价阿多诺的这两本书，发现二者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处。但与这种流行的观点不同，阿多诺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从辩证的角度出发反对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但他并非要回到黑格尔的观念论的思辨哲学那里去；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秉持经验依据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但这并非意味着他要抛弃辩证的思维方式。阿多诺之所以这样做是

^① 这里不一一列举这八本著作，我想提及其中的三本：张一兵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这是国内最早系统地解读和研究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著作；此外较有特色的解读还有郑伟的《经验与星丛：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王晓升的《形而上学的重构——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导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等。

因为他认为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和概念论的思辨哲学在导致现代性危机方面异曲同工。在此出错的不是经验和辩证法本身，而是实证主义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概念本体论的思辨哲学体系。阿多诺想澄清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原则区别。否则人们会认为，“启蒙辩证法”对实证主义的扬弃无非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复黑格尔对17、18世纪启蒙危机的辩证思考。

二、“瓦解的逻辑”和对黑格尔的观念本体论的批判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表明他所主张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观念论的“同一性”辩证法针锋相对：它的特色是“否定”，就是瓦解黑格尔所主张的概念自身运动的逻辑体系，因此这种“否定的辩证法”也可以称为“瓦解的逻辑”。与此相应，这种辩证法坚持朝向客体本身的原则，主张事物的客观存在优先于主观的概念构成。在此意义上，这种“否定的辩证法”通过否定观念论而转向唯物论。

阿多诺指出，虽然黑格尔在其辩证法体系中并没有否认矛盾和差异性，但是他所说的“矛盾”是从同一性方面来看非同一般的东西，是用统一性思维方式来衡量各种异质的东西。表面上，这种辩证法是在普遍与特殊、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展开的，但在这种展开的体系中特殊和差异却是由普遍和同一所主宰的。一切特殊和异质的东西都被强行编入他的辩证体系的展开环节中，仿佛只有经过他的磨盘的打磨和筛选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合理性。阿多诺表明他所主张的“否定的辩证法”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揭示客体优先于主体，其二是揭示个体、特殊和差异优先于一般、普遍和同一。这两个特点起到相互支撑的论证作用。

为什么必须主张客体优先于主体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认识首先感知到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东西，然后才据此形成一般的观念。一般的观念是主体对诸多差异的个体进行归纳、概括和抽象化的结果。这样形成的概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囊括在概念之下的特殊的某些共同的特征，但决不能把概念与其所指涉的东西等同起来，对象不可能完全消融在概念之中。主体通过概念指向某物，但某物并不消融在概念中。某物总是超出主体所构造的概念。这说明客体是主体不可消解的东西，是主体之外的存在。正是这种非同一性显示了物质第一性。在此意义上，阿多诺指出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关系：“辩证法通过向客体优先的过渡，就成为唯物主义的了。”^①

如果说坚持“客体优先”是阿多诺所倡导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瓦解的逻辑”就是这种“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二个特点。阿多诺写道：“这样的辩证法已不再与黑格尔的相容。”它的运动并不是朝向每一个对象与它的概念的差别中的同一性；相反，它质疑在其中同一的东西。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②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观念先在的辩证法，绝对观念经过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演化为千差万别的事物，而事物与概念之间的差别又同化到概念的同一性中去，因为它们本来就是概念演化的结果。阿多诺坚决反对黑格尔式的同一性思维方式，主张通过“瓦解的逻辑”揭示黑格尔式的同一性的辩证逻辑是不真实的。

在阿多诺看来，从柏拉图开始的传统的辩证法是以理念（观念、抽象概念）为本体的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传统中，“否定之否定”被理解为概念自身转化为对立面并又走向同一的一条辩证法原理。有鉴于此，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前言一开头就写道：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说法顶撞传统。早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就试图通过否定性的思维媒介来确立某种肯定的东西。后来它被简明地表述为否定之否定这个表达式。本书要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而同时又不放弃任何确定性。本书有意从这一悖谬的标题出发展开论述。^③

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就是从“正题”（These）到“反题”（Antithese）再到“合题”

①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66, S.191.

②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146.

③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7.

(Synthese)的过程。这种辩证法的体系建构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正是从纯粹的“有”(Sein)这个最抽象的概念出发的,它转化为其对立面纯粹的“无”(Nichts),然后经过“有”和“无”这两个环节表现生存和消亡的变化。这种辩证法从一到多、从抽象到具体、从理念到现实,最后又回归到绝对同一的“有”。在这种观念论的辩证法体系中,主体优先于客体,抽象的观念优先于具体的事实。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实体即主体”:作为实体的观念是主体,具有能动性,自己树立自身为对立面,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通过螺旋式的辩证运动最终重建自身的统一性。

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观念论的辩证法看似很玄妙,但充其量只能表述概念之间的互相联系和推导关系。这种本体论的概念体系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主观建构,是企图把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的东西硬塞到僵硬的概念框架中去,用预先设想好的概念的逻辑演绎说明世界演变的合理性。事物是无限丰富和千差万别的。当用一种同一性的原则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时,被纳入一般概念中的事物之间的差异性(非同一性)和经验的丰富性就可能被忽视,这就导致经验的贫乏。一旦抽象的概念体系凌驾于真实的世界之上,世界的丰富性和事物的差别性就会遭到排斥,具体性就会遭到压抑,这在凭借权力掌管世界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中尤其如此。阿多诺写道:

辩证法所导致的经验的贫乏表明,这种贫乏的经验自身完全与这个被管制的世界的抽象的单一性相适应,尽管健康的观点对此感到愤慨。经验贫乏的痛苦是它被提升到概念而产生的痛苦。认知不得不屈从于这样的一种辩证法:当它不想让具体性遭到意识形态再次贬抑时,这种贬抑实际上已经开始。^①

在阿多诺看来,反犹主义是在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助长下形成的意识形态。纳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个领袖;犹太民族及其文化是异类、异己,应该遭到排斥和消灭。在这种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压抑下,犹太民族有着非常痛苦的经验,其他民族和文化团体也有类似的痛苦经验。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这种痛苦经验的集中体现,是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悲惨的表现形态。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的“同一性”概念排斥了非同一的东西,导致抹杀差异性和多样性,这非但不能克服现代性危机反而加深这种危机,并会在“同一性”的名义下为法西斯的排斥文化异类和反犹主义寻找借口。

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与哲学的终结和出路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导论开篇用两句震撼性的话概述了哲学在当代的处境:“哲学一度显得过时了,它却因错过了实现自己的时机而存活了下来。总结性的论断是,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并在现实面前听天由命而自废武功;改变世界的失败意味着理性的无能为力,这导致理性的失败主义。”^②如果不了解法兰克福学派及当时德国哲学界争论的问题和相关语境,那么阿多诺的这两句话顿时就会令人陷入云里雾里。阿多诺的作品犹如“天书”的原因就在于,他往往假定读者知道他评论所指向的对象及其观点的上下文。他不喜欢做注解和引证他所批评的观点的出处,或许是因为他的报告或文章是写给专业圈子里的人看的,或许是他有意使用暗喻笔法借机发挥。下面我们结合相关背景知识做一下解释。

按照实证主义的看法,人类的思想方式经历神学、哲学和科学三个阶段:神学阶段的思想以神话与宗教为特色;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它被形而上学的哲学阶段代替;到了现代,哲学阶段又被依据经验事实和实证检验的科学阶段替代。按照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说法:“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③这意味,每一种合乎理性的观念都将顺应历史的发展而成为

^①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16.

^②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13.

^③ 转引自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现实，并也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谈到：“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①“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②恩格斯在该书还附录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马克思有关哲学的总结性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由此可见，谈论哲学的“过时”“终结”或“出路”一度是哲学界的热门话题。然而，哲学终结了没有呢？哲学的出路找到了没有呢？实证主义有关哲学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哲学并没有被科学所取代，也没有迎来它所宣称的划时代的进步；实证主义的主张反倒助长了工具理性和物化，并导致现代性走入困境。那么启蒙以来的近代哲学家阐发的有关人类社会的那些美好理念是否实现了呢？可以说大都没有实现。这是为什么呢？一种说法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条件还没有成熟，还需要耐心等待。不仅实证主义这样说，黑格尔有关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论断，也助长了这种看法：既然一种有关社会的理念还没有能够实现自己，那就意味着它在现阶段还缺乏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阿多诺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启蒙理性有关人的自由平等的理念还没有实现呢？为什么马克思有关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理念还没有实现呢？有一种观点这样解释：社会条件已经成熟，但相关的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没有能够抓住实现这些理念的革命时机。卢卡奇和柯尔施（Karl Korsch）最早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工业不发达的俄国，革命者抓住机会发动了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而在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尽管条件已经成熟，但工人运动的组织者错失了机会。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等待经济条件的自然成熟，不主动去抓革命的时机。此外，人们长期受到既得利益的权力机构的虚假意识形态的欺骗，而革命者又没有主动去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些都是导致错失时机的原因。阿多诺倾向于接受卢卡奇和柯尔施有关主观能动性和革命觉悟的看法，但认为不能因强调精神的作用而回到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应像对实证主义哲学一样采取批判的态度。

阿多诺认为，实证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侵蚀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阶层和马克思主义学界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他们要么沿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正统派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实证主义的解释，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要么沿着观念论的思辨哲学的思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关联，把革命的实践强行纳入绝对观念自身运动的哲学体系中去。他们强调要用哲学去教育工人和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泛泛而言，这固然没有错。但这种哲学不应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哲学，而应是客体优先的唯物论的实践哲学。从表面上看，这两派似乎都能从马恩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符合自己观点的论述：前者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为依据对历史唯物论做实证科学的解释，打造一个科学主义的晚年马克思形象；后者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打造一个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形象。其实，他们都是断章取义。阿多诺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字里行间批判了这两派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争辩的语境中创作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该做些什么呢？哲学的出路何在呢？马克思宣判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阿多诺显然接受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判断。现在的问题在于哲学如何才能为“改造世界”服务。如果哲学只能做“解释世界”的事情，过去和将来一贯如此，这就意味着理性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这导致理性的失败。阿多诺像卢卡奇一样认为哲学不应为遥遥无期地等待革命时机的条件成熟而辩护，而应该积极主动在“改造世界”方面有所作为。但阿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诺着眼于建立一种理论与行动相统一的实践哲学。在这种实践哲学中，哲学家应该站出来批判各种各样保守的意识形态，揭露实证主义和同一性的思辨哲学如何为现存的社会秩序辩护。哲学应该通过批判旧世界而起到培养民众觉悟和发动革命的作用。哲学应该铭记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理论来源于现实世界，但也推动改造现实世界。这就是阿多诺为批判理论提出的任务。他写道：“变化着的实践需要批判的思想。哲学应该与现实融为一体或与改造现实紧密地站在一起；一旦这一承诺被打破，哲学就必须无情地批判自己。”^①

由此可见，“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是摆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面前亟待重点思考的问题。有关这种关系存在如下两种看法：（1）既然哲学无非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那么哲学必须被抛弃，而由革命实践所取代。（2）世界很复杂，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哲学决不会终结。

在阿多诺看来，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不能割裂开来，而应在实践中统一起来。正确地认识世界，有助于有效地改造世界。只有解释清楚了行动的目的和意义，才能有效地激发行动者投入行动。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②这生动地表明了“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区别，但并不意味要把“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割裂开来，因为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哲学不应该放弃与现实融为一体或与改造现实紧密地站在一起的承诺；否则哲学就必须起来无情地批判自己。德语 *Ausgang* 具有“终结”和“出路”的双重意义。因此，哲学的“终结”也可以意味着哲学的“出路”；以解释世界为己任的以往的哲学终结了，意味着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开启了。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论证：黑格尔的学说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空间，既可做保守的解释也可做革命的解释。在当时的德国，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大都相当保守，而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人，大都相当激进。“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④

阿多诺虽然没有直接引证恩格斯的这段话，但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显然针对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如下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否抽离出他的辩证法为革命的思想服务呢？在阿多诺看来，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什么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呢？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种观念本体论，即以绝对观念作为原初和终极的本体：绝对观念自身展开，并以辩证的方式向着终极目标演化，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目的论的整体性的观念体系。什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呢？这种辩证法是绝对观念在一种观念本体论体系中展开自身的方式。通常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要义是“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在阿多诺看来，在黑格尔那里，矛盾之对立统一的运动和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是由黑格尔的目的论的概念体系保障的。绝对精神有一个目的论的发展方向。每一种观念（概念、理念）通过其对立统一的运动，上升到一种更高级的观念；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一种低阶的同一性过渡到一种高阶的同一性。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肯定，差异和对立面转化的结果是同一。为什么说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的后一种同一性要比前一种同一性更加高级呢？这是由黑格尔的体系预先设计好和安排好的。由此可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从他的体系中抽离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社会历史哲学而言，黑格尔不是简单地根据价值理念和社会规范去评价社会行动和历史事件，而是更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已经具备的条件。黑格尔认为，价值理念和社会规范是在社会历

①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13.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④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

史中演变的，其合理性也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他以历史性的眼光评价人类在社会历史中的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从这一角度看，黑格尔评价社会历史的方式相比康德等从先天原理出发的方式有很大的优越之处，因为他引入了“辩证的历史观”这个概念，这也为他的著名论断“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思想方法在这一维度上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赞扬。然而，阿多诺发现这里依然有两个问题需要警觉：（1）本体论的概念体系与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矛盾；（2）本体论的概念体系易于演变成为一种虚假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

黑格尔的本体论的基础是观念。也就是说，观念是本体，观念先于实践经验，一般先于个别，抽象先于具体，物质世界是从观念的演变中产生出来的。从唯物论的观点看，人的思想来源于实践，抽象的概念是从具体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头足倒置的。当然，马克思也很重视思想的能动性和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阿多诺赞同马克思的上述看法，但他强调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理论体系经常与现实经验之间产生矛盾。理论一经形成，由于其自身设立的原理和概念体系在逻辑推导上的融洽性，往往倾向于排斥与之相矛盾的经验。而且，概念体系被使用久了，会形成人们思想上的惯性，人们容易把自己建构起来的认知范畴、概念框架和思想模式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抵制根据新的经验去修正和否定它们。尤其黑格尔的那种观念本体论的思辨哲学容易被神化和滥用——辩证法常被当作保护伞，成了一种论辩术和修辞手段，甚至成为一种辩护自己意见合理性的借口。再说，一种哲学体系一旦与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成为一种虚假的欺骗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讥讽辩证法是一种把黑说成白或把好说成坏的诡辩游戏或强词夺理的方式。面对这样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辩证法本身具有两面性：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既可成为一种体系建构和体系维护的思想方式，也可成为一种体系瓦解和体系否定的思想方式。一旦辩证法沦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手段，那么我们理应用辩证的方式在内部瓦解这样的思想体系。

到此为止，可以对阿多诺有关“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做一小结：

（1）《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这两本著作之间存在关联和差别。这种关联在于它们都是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思潮的批判性反思，它们的差别体现在前者的主线索是对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而后者的主线索是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批判。鉴于欧洲近代启蒙哲学既包括英国的经验论和实证主义，也包括欧陆的唯理论和思辨哲学，它们都属于对启蒙思潮进行批判反思的范围，《否定的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启蒙辩证法》的扩充推进和至臻完备。

（2）《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方法是一种“瓦解的逻辑”，旨在瓦解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以概念体系形态表现出来的本体论哲学传统，旨在揭示概念的实践起源，批评凝固的概念体系对实践造成的危害，并指出这种同一性的体系哲学在当代往往成为一种漠视差别和排斥异议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于阿多诺等社会批判理论家而言，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痛苦经验莫过于“物化”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他们看来，实证主义对物化意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以本体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性辩证法成了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支柱。这两种思潮看似相反，却以互补的方式把现代社会推向困境。要完成对现代性的批判，必须揭示它们在逻辑的合理性掩盖下的悖谬，克服它们对现实社会造成的危害。

（3）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有人认为阿多诺的“瓦解的逻辑”开创了解构主义的先河，阿多诺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然而，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阿多诺并非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宣称“哲学死了”“主体死了”，而是在坚持客观存在优先的前提下，强调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发扬主体的批判精神，努力建构一种具有创造性活力的实践哲学。如果对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更容易看清阿多诺写作《否定的辩证法》的意图。他想说明哲学在“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关系。在阿多诺看来，以本体论为标志的西方传统哲学已经走到尽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实践哲学迎来了曙光。哲学如果要为改造世界有所贡献，它就必须成为一种批判的哲学，这类似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所做的工作。

阿多诺通过“瓦解的逻辑”打破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把差异性、特殊性和具体性从同一性的体系哲学中解放出来，有助于营造一种星丛般的多元文化的格局。在阿多诺看来，人的实践总是与其周围的具体环境和时代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人的实践的价值取向和目的追求也受到其阶级利益的制约，因而从人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必定是多元的。阿多诺用天文学中的“星丛”这个词语来形容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然而，人在社会生活中除了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差异性之外，还存在互相协作的一面，需要通过思想交流和民主协商达成共识，解决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阿多诺由于过早逝世，并没有来得及完成其有关实践哲学的全部思考和写作规划。阿多诺的这条思路以及遗留任务被哈贝马斯等新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继承和发展。哈贝马斯倡导交往行为理论，研究公共领域的言语机制和生活世界对人的认识的奠基作用，致力于发挥批判理论在人类解放事业中的作用，可谓对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推进或修补。

(责任编辑：周小玲)

“The Logic of Disintegration” and the Way Out of Modernity: An Exploration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ZHANG Qingxiong

Abstract: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centering on the “logic of disintegration”, launches a dual critique of modern philosophy: it targets both the reification crisis stemming from positivis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philosophical shackles of Hegelian idealist dialectics, which subsumes differences under “identity”. By examining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and *Negative Dialectics*, the evolution of Adorno’s critical logic becomes evident. The former dissects how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degenerates into a tool for dominating nature, while the latter expands into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n Kantian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Hegelian dialectics, and phenomenology, emphasiz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priority of the object” and “non-identity” to disintegrate the homogenizing system of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dorno argues that Hegelian dialectics, by subordinating differences to abstract concepts and suppressing concrete experience, ultimately serves a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otalitarian ideologies, whereas positivism dissolves subjective values through its logic of experiential impoverishment. Together, these frameworks constitute the root of modernity’s crisis. Philosophy must transcend the conservatism of merely “interpreting the world” and shift toward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of “changing the world”. Critical theory awakens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gainst reified reality by exposing the falsity of identity-thinking, while the metaphor of “constellation” points to an emancipatory path of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This critique bridges the practical tradition of Marxism and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underscor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negative dialectics in critiquing modernity and advancing human liberation.

Keywords: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Logic of Disassembly;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